

回首南粵

王星華

回首南粵

王星華

(內部參考)

南粵歷史研究會

一九九五年

目 錄

也談陶鑄（序言）.....	1-2頁
陶鑄的“廣東幹部嚴重不純”論.....	3-8頁
方方冤案本末.....	9-23頁
陶鑄主持下的廣東土改.....	24-33頁
松仔嶺事件.....	34-43頁
樓山鄉事件.....	44-46頁
江門事件.....	47-56頁
廣東歷史問題大辯論——陶鑄的陽謀..	57-62頁
馮古聯盟——反對地方主義.....	63-76頁
後語.....	77-79頁

也談陶鑄（序言）

近年廣東在徵集研究建國後史料方面進展很好。有的縣市通過回顧解放初期的歷史，結合討論冤假錯案的平反，客觀地總結經驗教訓，對教育幹部群眾收到良好效果。

人們在討論廣東過去發生的一些冤假錯案時，很自然聯系到當時廣東領導人陶鑄身上。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是無可避免的。

陶鑄一九〇八年生於湖南省祁陽縣。一九二六年入黃埔軍校，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福建、湖北、延安和東北等地工作。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陶鑄在廣東工作達十五年之久。曾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四書記、華南分局代理書記、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一九六六年六月陶鑄調往北京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其後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組顧問。一九六七年一月，陶鑄被江青等人陷害，打成“判徒”，受盡折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在安徽病逝，終年六十一歲。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中央認為過去把陶鑄定為叛徒是不對的，宣佈給予平反。並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北京舉行“陶鑄同志追悼會”。

本文回顧解放初期廣東發生的一些事件，就陶鑄工作中的缺失與錯誤問題，談談個人的看法，作為本人在歷史研討會的書面發言。

筆者以尊重史實的態度，將當年所發生的事件原原

本本揭露出來，目的是分清是非，糾正被歪曲的歷史，爲被冤屈的人討回公道。同時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批判“左”的思想，宣傳黨的正確路線，統一認識，團結起來向前看。以求真正做到實事求是，撥亂反正，以史爲鑑，教育後人。這是符合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

本文所述事件，多爲本人耳聞目見，再印証有關史料，舉例以粵中地區較多，稍嫌局限。希望本文能引起讀者共鳴，作進一步的探討。這對廣東建國後史料的研究，相信是有助益的。由於筆者水平所限，對中央文件精神領會不深，談論近於膚淺，且難免有偏頗和錯誤之處，誠盼讀者賜予批評指正。

陶鑄的“廣東幹部嚴重不純”論

陶鑄於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到達廣東，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四書記。下車伊始，就亂發議論。在多次大會上講話，都說廣東情況複雜，幹部隊伍嚴重不純。他說，廣東是沿海省份，毗鄰港澳，海外關係多，交往頻繁，易受資本主義思想侵襲。特別是敵人利用港澳進行反革命特務活動，通過各種渠道向內地滲透。因此，反映到廣東黨內思想上、組織上嚴重不純。估計廣東黨內幹部，地級基本上是我們的；縣級大部份是我們的，小部份是敵人的；區級大部份是敵人的。這種說法顯然是沒有根據的，是十分錯誤的。

廣東地處南方沿海，華僑眾多，與海外交往較多，很早就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鴉片戰爭之後，列強在中國沿海地區設立教堂，辦學校，開醫院，傾銷商品，興辦工業。資產階級思想也得以傳播。在這個過程中，廣東人民接受了西方科學文化，也激發了改良致富和反抗侵略的愛國主義思想。

廣東華僑眾多，是長期歷史形成的。廣東人出國，有些是從事海外貿易，有些是逃避戰亂，更多的是破產農民、手工業者、小商販，在國內無以為生，才飄洋出海求生路。有些是被西方殖民主義者以賣豬仔方式強擄出國的。他們在國外同樣受到資本家剝削壓迫。他們盼望祖國獨立富強，他們具有熱愛祖國熱愛家鄉的優良傳統，他們對中國民主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以及祖國的經濟文化建設，都有重大的貢獻。

把“海外關係多”當為廣東幹部不純的根據，是片

面的。廣東人海外關係多，是地理環境和社會歷史長期形成的，這種關係，可以廣交五洲朋友，得風氣之先，接受新事物，促進社會改造和進步。鄧小平說，海外關係是個好東西。是很有道理的。

把“毗鄰港澳”當爲廣東幹部不純的根據，也是片面的。香港和澳門在殖民主義者暫時統治下，反動派和反華勢力可以利用它爲活動基地，作爲進入內地的跳板。但這個地方敵人可以利用，我們也可以利用。拿香港來說，它長期是我們的聯絡站和交通走廊。香港有我們地下黨的市委機關。土地革命時期，廣東省委領導機關長期設在香港。抗日初期，香港青年成批返內地參加抗日救亡工作，參加東江縱隊。一九四一年後，東縱的一支武裝隊伍——港九抗日游擊大隊，活躍在香港、九龍，有力地打擊日偽的統治。解放戰爭時期，我黨南方領導機關就設在香港，許多重要會議和幹部訓練班都在此舉行。許多民主黨派的代表人物和文化界著名人士，在內地城市被蔣介石迫害無法立足，就轉移到香港來活動。一九四九年形勢好轉，華南分局又遵照中央指示，妥善安排李濟深、沈鈞儒、譚平山、蔡廷鍔、郭沫若、馬敘倫、章伯鈞、黃炎培和茅盾等一百多人，分批護送到北平，參加新政協會議。有些人慣於片面看問題，是無法正確認識客觀事物的。他們只把香港看作是可怕的罪惡之地，是不夠全面的。

要正確認識廣東黨，最好是重溫一下廣東人民革命鬥爭的歷史。

廣東人民在反帝反封建鬥爭中一直站在全國的最前列，作出了杰出的貢獻。一八三九年林則徐在虎門燒毀鴉片，愛國官兵在九龍、穿鼻洋等地多次擊退英國侵略

軍。一八四〇年廣州三元里人民高舉義旗，痛擊英軍，寫下了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光輝一頁。廣東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武裝起義——太平天國農民革命，發起於廣東花縣。其後，康、梁維新運動，促進了人們改良政治、富強救國的覺醒。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的統治。辛亥革命失敗後，南北軍閥統治全國各地。孫中山以廣東為基地，在廣東工農群眾支持下成立革命政權。一九二四年在廣州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改組國民黨，組織軍隊，舉行北伐。這一時期廣東農民運動迅猛發展，全省農會會員六十萬人，農民自衛軍三萬多人。工人運動也迅速發展，全國總工會在廣州成立。一九二五年舉行了省港工人大罷工，顯示了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正由於工農群眾的支持，使北伐軍節節勝利，給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以沉重打擊。

蔣介石背叛革命以後，廣東反革命勢力瘋狂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白色恐怖籠罩南粵。廣東人民在中共領導下奮起反抗，分散轉移，堅持鬥爭，紅旗不倒。

抗日戰爭開始後，廣東人民在中共領導下發起抗日救亡運動，積極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在東江、珠江三角洲、粵中、海南島等地區，抗日武裝鬥爭蓬勃興起，有力地抗擊日寇的侵略。到一九四五年，廣東人民抗日武裝擁有正規部隊二萬八千人，民兵數萬人，解放區和游擊區人口達一千萬人。

抗日戰爭勝利後，由於蔣介石發動內戰，廣東黨發動群眾進行反內戰、爭民主的武裝鬥爭，給予蔣介石反動政權沉重打擊。人民武裝力量迅速壯大，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全省已成立了六個縱隊，指戰員八萬多人。解放了大部分農村，三分之一地區成立了人民政權。在群

眾運動和武裝鬥爭過程中，黨組織也有了較大的發展，至一九四九年八月，全省已建立了七個區黨委，二十四個地委和近百個縣委，黨員三萬多人。

對於這一時期廣東黨的工作，中共中央是給予肯定的。一九四九年九月，黨中央在給葉劍英和南下大軍的電報中指出：“方方等同志領導的華南分局及華南各地黨委和人民武裝有很大的成績。新的華南分局及即將進入華南的解放軍主力，應對這種成績有足夠的恰當的估計，使兩方面的同志團結融洽，互相學習，取長補短，以利爭取偉大的勝利。”根據這一指示，華南分局贛州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過去華南及廣東工作的決議》，充份肯定方方等領導的華南分局的成績。決議說：“方方同志等領導的華南分局和各地黨委，自一九四六年以來，在廣東及華南各省領導人民的武裝鬥爭和各項工作，是有很大成績的”。“這些成績就使得華南敵後的人民戰爭，得以堅持下來，配合了三年來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同時，又給人民解放軍主力進入華南及廣東作戰，最後解放華南及廣東的任務，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一九四九年秋，解放軍浩蕩南進，在廣東地方部隊配合下，十月解放廣州，十一月解放全省大陸。一九五〇年五月，解放大軍在瓊崖縱隊配合下解放海南島。八月解放萬山群島，宣告全省解放。這是廣東人民在黨中央領導下長期鬥爭的結果。

廣東黨是在長期革命鬥爭中鍛練成長的堅強的黨組織。廣東黨是全國最早建立的地方組織之一。一九二〇年廣東產業工人已達六十萬人，“五四”運動後，一些先進知識分子在工人群眾和青年學生中傳播馬列主義思想，促進了馬列主義和廣東工人運動的結合。廣東黨的

產生是具備了必要的階級基礎和思想基礎的。一九二一年廣東黨組織建立後，在廣東領導了許多重大的革命活動，堅持了長期艱苦卓絕的鬥爭，犧牲了無數先烈。歷任省委書記二十八人中，有八人被捕犧牲。雖遭破壞和挫折，歷盡艱險，百折不撓，堅持鬥爭，直至最後勝利。解放戰爭時期，廣東黨的工作取得較大成績，更為中央所贊許。

試問，如果廣東黨真像陶鑄所說的那樣嚴重不純，基層幹部大部分是“敵人的”，我們廣東黨何以能堅持長期鬥爭？何以能領導廣東人民革命取得輝煌的勝利？從廣東黨的革命鬥爭歷史來考察，陶鑄的廣東幹部嚴重不純論是毫無根據的。

從廣東解放初幾年審查幹部的結果看，陶鑄的“嚴重不純論”也是站不住腳的。一九五二年土改整隊處分的大批幹部，後來經過學習審查，這些幹部絕大多數是思想認識問題或立場觀點問題。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五年間，廣東經過鎮反結合清理中內層，審幹結合肅反運動，黨的幹部隊伍中有多少是陶鑄所說的“敵人的”幹部？查閱組織檔案就一清二礎。這一切，証明陶鑄的廣東幹部嚴重不純論是毫無事實根據的。

對廣東黨幹部的評價是一個大問題，理應在分局會議討論取得共識。陶鑄只憑個人主觀臆測，就大談“嚴重不純”，既未經分局領導層統一認識，又無事實根據，就持此錯誤觀點到處宣傳，這就涉及組織原則問題了。這不僅使人覺得他不夠鄭重，也難免使人懷疑他包藏禍心。

陶鑄的錯誤說法，謬種流傳，使一些南下幹部不尊重廣東人民革命鬥爭的歷史，歧視廣東幹部；也使廣東

幹部不服氣和消極抵制，造成南下幹部與本地幹部之間的不團結。這很明顯就是違反了中共中央一九四九年九月對華南工作的指示精神，也違反了華南分局贛州擴大會議關於肯定廣東工作成績的決議。陶鑄以這一錯誤觀點作為指導思想，使他無法正確執行黨的幹部政策，也使他在其他工作中出差錯。陶鑄在廣東經手炮製的冤假錯案，其思想根源亦在於此。

方方冤案本末

新的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於一九四九年九月成立於贛州。第一書記葉劍英，第二書記張雲逸，第三書記方方。南下大軍於同年十月解放廣州，華南分局機關隨後進入廣州，廣東省人民政府宣佈成立，隨即進行接管工作，建立各級人民政權，安定社會，恢復生產，發動群眾支持大軍繼續進軍。並在全省進行清匪反霸，組建農會、民兵，為土地改革準備條件。

一九五〇年六月，中央人民政府公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和劉少奇副主席《關於土地改革的報告》。中央人民政府計劃，尚未土改的二億六千萬農業人口的地區，將在今後二、三年內進行土改，其中的一億農業人口的地區，三百個縣，將在今冬實行土改。從今冬起，兩年半到三年內，基本完成全國的土改。

廣東根據中央的指示和布署，經中央、中南同意，於一九五〇年冬先在揭陽、興寧和龍川三個縣進行試點。廣東省成立了以方方為主任的土地改革委員會，進行大量調查研究工作，根據廣東的具體情況和特點，製訂了《廣東省土地改革實施辦法》，對保護華僑、保護工商業、保護愛國民主人士以及漁民問題、少數民族問題，都作了明確的規定。

為了做好試點工作，分局從黨校（當時稱革命幹部學校）學員中，抽調縣、區級幹部二百餘人，從南方大學抽調學員近千人，還有部份省直機關幹部，集中學習《土改法》和整頓思想。這些人員由土委會組成廣東省土改工作團，由省土委會副主任李堅真擔任團長。李堅

真是一九二七年參黨的老紅軍長征幹部，曾參加土地革命時期閩西地區土改和解放戰爭時期華東地區土改，經驗豐富。土改團下分三個分團，分別到三個試點縣去。每個分團都由省派出較強的地級幹部領導。加上當地挑選出來的地、縣、區幹部，陣容相當強大。

三縣開始試點後，分局又根據中央指示，增加八個試點縣，即全省共十一個試點縣。同時，各地委各自選擇個別區或鄉進行試點，摸索經驗。

一九五一年四月，分局舉行擴大幹部會議，總結十一個縣的試點經驗，並佈置下一步全省的土改工作。分局認為十一縣試點是成功的，按照中央的總路線總政策辦事，取得較好的成績，沒有大的偏差。總結了幾條主要經驗：大家認識到必須依靠貧僱農、團結中農，發動農民的大多數，建立自己的階級隊伍；大家認識到地主階級的頑強反抗，陰險毒辣進行破壞，必須發動群眾經過反復鬥爭，才能將之打垮；基層組織不純的，要認真加以整頓；幹部隊伍基本是好的，但亦暴露一些立場不穩，作風不純、包庇地主等問題，必須重視整頓幹部隊伍。這幾方面的問題，提高了大家的思想認識。會議號召大膽放手，依靠貧僱農，發動全體農民，猛烈開展大規模的清匪反霸、減租退押，以打垮地主惡霸的威風，樹立農民的革命優勢，全面向地主階級進攻。會議還提出依靠解放軍，結合地方幹部，全省動員，集中力量，爭取土改的徹底勝利。

會議決定，在取得試點經驗後，運動在全省六十四個縣鋪開。分局計劃：一九五一年冬至一九五二年春，全省大部份地區可以完成土改，一九五二年秋，可以全部完成。一九五二年冬進行復查，一九五三年春全省可

進入大規模生產運動。爲了完成此一計劃，除各地區幹部盡量調到土改前線外，分局還在省直機關抽調大量幹部下鄉，軍區也從部隊抽調大量幹部參加土改，軍區包二十二個縣。這樣，全省就有五萬幹部在幾十個縣、一千多萬人口的地區，開展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

分局還通過報刊、廣播電台、展覽會以及各種集會進行宣傳動員，發動全省人民以實際行動支援土改，大造聲勢。

正當方方竭盡全力進行土改工作的時候，卻受到了一些無理的指責，不但挑剔土改試點的缺點，而且涉及鋪開後分局的領導問題。

有人說，廣東土改試點是和平土改，沒有“農運高潮，殺人太少”。這一觀點是錯誤的。中央政策規定，對於罪大惡極、血債累累、民憤極大、抗拒破壞土改的不法地主，應依法予以審判和懲辦。嚴禁亂捕、亂打、亂殺及各種肉刑和變相肉刑。該殺多少人，決定於發動群眾。群眾思想覺悟了，起來揭發批判地主的罪惡，同地主作面對面的鬥爭。哪個是惡霸，哪個是不法地主，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根據群眾意見和人民法庭的調查審判，就可決定哪個地主惡霸該依法懲處。殺多少人不應由某個領導人決定，而是根據當地階級鬥爭情況和群眾意見來決定。如果群眾發動不充分，領導人指使殺多多的地主，群眾覺悟也不會提高，農運高潮不會真正出現。檢查土改是否成功，主要看群眾是否發動起來，地主階級是否被打倒了，而不是看殺人多少。單純以殺人來衡量高潮是否出現，或者主張多殺人造成“轟動”以打開土改局面，都是錯誤的。

有人說，廣東土改提出照顧華僑和工商業，是右傾

思想。這些人對廣東情況完全不了解。廣東華僑眾多，當年全省人口三千萬，全省在海外的華僑就逾六百萬人，省內僑眷五百多萬人。華僑大都是勞動人民，他們愛國愛鄉，僑眷中地主是極少數。廣東現代工業、手工業較有基礎，毗鄰港澳，交通方便，城市墟鎮商業網絡密布，商品經濟發達。土改是反封建，不是反資本主義。華南分局根據廣東社會特點來貫徹中央政策，提出保護華僑和工商業，既符合中央政策，又因應廣東實際情況。《廣東省土改實施辦法》經中央、中南批准執行，實踐中證明這些具體政策是完全正確的，怎能說是右傾？

有人說，廣東土改像烏龜慢爬。這是沒有根據的。從上述華南分局的土改計劃看，是符合中央人民政府的計劃要求的，中央要求未完成土改的地區，要在二、三年內完成。廣東試點縣由三個增加到十一個，試點取得成功經驗後，一九五一年春後向六十幾個縣鋪開，計劃於一九五二年冬完成全省土改，這是積極的穩快的計劃和行動，怎能說是龜步？

有人說，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拒絕先進經驗。事實並非如此。自一九五〇年六月中央頒佈了《土改法》後，分局即根據《土改法》和劉副主席報告精神，大力宣傳，教育幹部，布置和準備土改工作。一九五〇年十月，三縣試點開始，葉劍英又反復向幹部群眾交代，“土改是爲了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農業生產要服從於國家工業化。”廣東土改是在全國大陸已解放的新形勢下進行的。毛澤東指出：今天只解決一個封建問題。不要因土改又把階級關係搞得十分緊張。葉劍英就是從這一策略思想出發，教育幹部在土改

中注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不要滿足於似乎轟轟烈烈的局面，無分別的、無步驟的亂轟亂打。方方也多次強調堅決執行中央的土改總路線，要大家大放反封建之手。可見葉、方領導廣東土改，思想上是很明確的，完全根據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行事。中央頒布的《土改法》是根據戰爭時期的土改經驗，和全國大陸解放後新形勢、新要求而製定的。它是我黨土改經驗最新的總結，它指示了正確的方向。葉、方領導的土改，遵守《土改法》，並不存在所謂迷失方向問題。根據新形勢和廣東的實際情況，葉劍英主張廣東土改應參照北京郊區經驗，搞得溫和些。他從北京請來一批參加京郊土改有經驗的幹部，到三個試點縣當師傅、當顧問。從這裡可以看到葉、方對待京郊先進經驗的態度。廣東擴大試點後，有不少有土改經驗的南下幹部參加。全省鋪開後，南下幹部參加的就更多了。事實證明，葉劍英是最能領會中央政策精神，最能將中央政策與實際相結合，創造性地開展工作的典範。

有人說，土改運動中領導公開糾偏，是不相信群眾的表現。這說法是錯誤的。一九五一年夏，土改在全省鋪開後，有些地方出現亂打亂捕、無限清算的混亂現象。當時分局領導對此堅決予以糾正，葉、方公開講話，要求各級領導注意，糾正運動中出現的缺點和偏差，不能放任自流。指出我們要堅決消滅封建制度，又要保存資本主義；要發動依靠貧雇農，又要緊密地團結中農，聯合一切反封建力量，講究鬥爭策略。劉少奇在土改問題報告中說：在今後的土改中，不能容許混亂現象的發生，不能容許在偏向和混亂現象發生之後很久不加以糾正。……按照政策，有領導、有計劃、有秩序地去進行

分局對於違反政策的事例，公開提出糾正，使土改運動健康發展，正是堅持黨的領導，執行黨的政策正確行動。但是有人認為糾偏就是“潑冷水”，他們認為“群眾要求怎麼辦就怎麼辦”，採取放任群眾自發鬥爭的錯誤態度。必須指出，簡單地以北方地區戰爭時期土改的某些做法來比較，或者以二十年代湖南農民某些過火行動相提並論，都是不當的。全國大陸解放後，政治軍事形勢不同，我們衡量土改好壞的標準，只能是一九五〇年中央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和劉少奇《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精神。說葉、方糾偏是右傾，這些人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

以上這些從“左”的方面投來的無理指責，或者旁敲側擊，或者借意影射，有的則逕直以祖師爺的姿勢大言不慚，都是意圖對廣東土改給予貶伐和否定。這些言談和輿論，使幹部群眾思想混亂，造成工作上不應有的障礙。

廣東試點工作及其後鋪開，都是符合分局穩快的要求的。對已完成土改地區的復查，從大的方面看，群眾大多數是發動起來了，以貧僱農為骨幹，團結中農，在農會和民兵的統治下，建立了農村新秩序；運用大會小會面對面的說理鬥爭，人民法庭配合依法懲辦敢於反抗的地主惡霸，地主階級是被打倒了；群眾獲得土地果實，以高度熱情投入生產，青年參軍抗美援朝十分踴躍。在保護華僑和工商業方面，沒有出現大偏差。這一切都是華南分局貫徹執行中央土改總路線總政策的結果。運動有缺點均已逐漸克服，不能誇大某些缺點，以偏概全，隨便給前段土改戴“和平土改”的帽子。群眾發動起